

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

王 进 著

*The Theoretical Space of
Cultural Poetics*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

100



100

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

王 进 著

*The Theoretical Space of
Cultural Poetics*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 / 王进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668 - 1085 - 4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诗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8793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

定 价: 2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蒋述卓

在我的印象中，王进是一位说话不多却默默干活、有着执着的学术追求的青年学者。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及其发展方向很有自信，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再扩展到一个面，不急不躁地做着研究，发表着成熟的论文，最后一本又一本地出着书。我很欣赏他的这种学术态度和研究路径，也关注着他的每一次进步。

这本《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就是他从自己的博士论文《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2008年答辩，2012年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延伸出来的新课题，做出的新成果。他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主要研究的是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领袖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文学批评理论，并由此对建立在新历史主义基础上的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空间进行较系统的论述。而这本《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则将视角伸向了文化诗学在中国的旅行历程，探讨了文化诗学中国化的相关问题，并同时对中国文化诗学在理论空间拓展及其实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预测。

这是他在学术上敢于探索、勇于探索的表现，也是他在学术上始终坚持“问题意识”，从疑处出发，从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学术研究的学术自信。从本土出发，从问题出发，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正是他这本书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的内驱力。

他回顾了文化诗学在中国土壤、中国语境的成长历程：从译介到理论参照，从理论建构到批评实践，其认为“20多年的理论阐释和文化建构过程，已经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实践经验熔铸一炉，并在文艺学界不断产生范围宽广而意义深远的重要理论影响”，这种判断是符合文化诗学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实际的。比较可贵的是，他一定要把这种判断坐实，坚持去梳理文化诗学的理论谱系、诗性空间、生态建构及其批判生

长，努力去寻找中西方文化诗学的接合点以及文化诗学在中国本土的生长点。

其实，一种西方的理论进入中国，从译介到实践运用，都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这里首先有个水土服不服的问题，也就是语境是否能够恰当地转换；其次是它可能会发生变异，也可能是基于某一点而加以伸展，变化成中国的理论话语；最后是在实践运用时也会根据中国国情而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即拓展出新的理论空间。文化诗学进入中国大抵也如此。

唯其如此，王进在最后探讨文化诗学的理论前景的时候，还是说西方的较多，对中国本土的文化诗学的发展还缺乏更有预见性的探讨，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文化诗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尚未成熟，都还在路上。尽管我们的学者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要建构起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话语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当然，王进此书的梳理与探讨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因为它至少让我们对此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也让我们更为自觉地去努力实践文化诗学。

2014年，王进有幸被列入暨南大学“杰出青年学者”支持计划的行列，这既是鼓励，也是挑战，相信他在未来的学术研究道路上会有更多的创造，取得更令人满意的成果。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于暨南园

目 录

序	(1)
第1章 文化诗学的本土语境	(1)
1.1 从理论旅行到文化过滤：文化诗学的传播状况	(3)
1.2 从文学文本到文化现象：文化诗学的本土进程	(11)
1.3 从文化现象到诗学关怀：文化诗学的多元格局	(19)
第2章 文化诗学的理论谱系	(29)
2.1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批评的诗性转向	(29)
2.2 新理性精神与文化的诗学复兴	(37)
2.3 历史性回归与文化诗学的勃兴	(45)
第3章 文化诗学的诗性空间	(51)
3.1 文化诗学的文学诗性观念	(52)
3.2 文化诗学的历史诗性观念	(58)
3.3 文化诗学的文化诗性观念	(66)
3.4 文化诗学的主体诗性观念	(74)
第4章 文化诗学的生态建构	(82)
4.1 文化诗学与新文学史问题	(83)
4.2 文化诗学与历史记忆问题	(91)
4.3 文化诗学与理论生态问题	(98)
4.4 文化诗学与文化和谐问题	(106)

第 5 章 文化诗学的批判生长	(113)
5.1 文化诗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114)
5.2 文化诗学与城市文化批评	(120)
5.3 文化诗学与海华文学研究	(128)
5.4 文化诗学与翻译传播研究	(138)
第 6 章 文化诗学的理论前景	(147)
6.1 文化诗学与文化批评的生存问题	(148)
6.2 文化诗学与历史阐释的生态问题	(155)
6.3 文化诗学与诗意建构的边界问题	(163)
6.4 文化诗学与理论话语的增殖问题	(169)
6.5 中国学派的建构问题	(177)
结语：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交往空间	(184)
参考文献	(191)
后 记	(198)

第1章 文化诗学的本土语境

文化诗学在欧美学界的全面崛起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新历史主义思潮，而它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勃兴却是伴随着国内文坛逐渐兴起的历史文学和文化研究热潮，一直以来得到童庆炳、蒋述卓和刘庆璋等知名理论家的积极倡导。相比中国传统诗学诸如“兴观群怨说”、“以意逆志说”，以及“诗外功夫说”之类朴素混沌的文化批评观念，当下语境的文化诗学经历过后现代文化的思想洗礼后，更加突出其方法论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新意。^①然而，作为某种“始终在路上”的开放性理论体系，文化诗学一方面通过文化研究的“批评介入”逐渐实现自身向欧洲批评学界的理论延伸，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建构的“理论旅行”不断实现自身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的体系重建。

如果说文化诗学向文化研究的理论延伸，可以看作美国实用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和欧陆理性主义传统之间的双向理论商讨，那么文化诗学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旅行”则表现为本土文化对美国新历史主义进行文论阐释和文化建构的单向移植过程。虽然有学者乐观地认为，“中国新时期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文艺实践（尽管与国外新历史主义之间存在着差异），就可以成为国外新历史主义的‘厚描’意义上的语境和参照系”^②，但是在文化诗学的“理论旅行”过程中，同时面临着理论阐释过甚和批评经验匮乏的历史困境。诚如高小康先生指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们曾经“过分急切的热情面对的是阐释、理解这些思想成果的语境相对残缺”，但是这种囫圇吞枣的理论阐释无法避免“五花八门的陌生概念术语和形形色

① 童庆炳：《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文艺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33 ~ 35 页。

② 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6 页。

色的新奇理论观念对文学现象的狂轰滥炸”。^① 新历史主义批评自然是属于那些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过度阐释和对中国文学现象形成“狂轰滥炸”之势的新奇理论。然而，与其他学派的西方理论思想在现阶段中国学界所形成的浩大声势和研究热潮相比，文化诗学始终是当代西方文论本土化研究的理论软肋和批评盲点。

一般来说，拥有外文研究背景的研究者通常认为，文化诗学主要作为一种历史批评实践，缺少文学批评方法的那种理论规范，因此主张采纳“先使用思想”的唯名论逻辑；而具有中文研究背景的研究者则坚持，文化诗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缺少当代批评理论的完备体系和严谨结构，因而提倡践行“先输入名词”的唯实论思路。针对异质理论的跨文化传播，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中曾经指出：首先，“理论旅行”的起点，或者是“特定观念得到生产或进入话语的初始环境的集合体”；其次，文化距离，即“特定观念通过各种语境之中的某种压力在实践时空旅行之后而达到崭新高度的某种通道”；再次，存在各种条件的特定集合体，即“无论看似另类而必须接受或容忍的各种条件”；最后，开放性的担负各种象征性阐释效果，即“现今已经全部（或部分）适应（或被组合）的理论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它在新时空之中的新用途和新位置而不断得到改造”。^② 因此，本章将重点关注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当代中国的理论传播和历史影响，在文论阐释和文化建构深度关联当中重新认识文化诗学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不同理论形态和诗学理想。具体来说，就是要从文论翻译和文化建构的批评视角来综合考察文化诗学在“理论旅行”的四个重要环节当中的历史状况和未来走向，即在从理论旅行到文化过滤的理论传播过程中梳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中国大陆学界的译介情况和传播历程；在从文学文本到文化现象的理论建构过程中澄清文化诗学在中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理论特征和导向差异；在从文化现象到诗学关怀的理论增殖过程中呈现文化诗学在当代中国学界的多样化形式和多元化道路；在从历史意识到文化传播的

① 高小康：《理论过剩与经验匮乏》，《文艺研究》2005 年第 11 期，第 5～10 页。

② 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26–227.

理论转型过程中展望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局限与未来走向。

1.1 从理论旅行到文化过滤：文化诗学的传播状况

从理论旅行的历史过程来看，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批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文论译介热潮逐渐传入中国大陆学界的并在文化过滤过程中不断生成新兴的理论增长点。根据王宁先生的理论回溯，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学界的登陆契机是1987年以“历史、文学和文学史”为名的中美第二届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在此次大会上，厄尔·迈纳（Earl Miner）教授的论文《历史·文学·文学史——中美第二届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侧记》（载于《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分析探讨“事件的历史”与“述说的历史”的不同范式和理论差别；同期与会的北京大学英语系杨周翰教授的论文《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作文文学的历史叙述》则详细梳理了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叙述理论，以比较文化的研究视角深入探讨中外史论家的理论观念和批评实践。^①国际学术会议的春风和国内理论学者的译介兴趣将新历史主义不断引入中国学界的理论视野。实际上，早在1982年，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先生在北京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期间就已经在积极介绍这一新兴批评思潮了，只是当时没有引起相应的理论关注和研究兴趣。^②因此，颇为有趣的现象就是，代表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学界首次亮相的是海登·怀

①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72页。

② 根据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本人的叙述，他于1982年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访问期间，为北京大学师生们共计做了六次学术讲座。其中，四次是关于莎士比亚与前现代文化研究的，两次是关于当代美国文学和批评的最新动向的，其中就重点介绍了文艺复兴文学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观念，此外还包括多次非正式的小规模研讨会。在此期间，他曾前往西安的高校，也做了几场诸如此类的学术讲座。详见：Stephen Greenblatt, “China: Visiting Rites”, *Raritan*, 1983, 2 (4), pp. 1-23; “China: Visiting Rites (II)”, *Raritan*, 1985, 4 (4), pp. 44-56。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国和美国恢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久，两国之间的各种学术交流也刚刚开始。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格林布拉特来到北京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积极推进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一方面有助于国内学界了解和重视当时美国的理论发展动态；另一方面，他的这两篇中国学术游记在美国学界的公开发表，也有助于美国学界重新认识和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学术状况。这两篇文章后来均被收录于 Michael Payne (ed.), *The Greenblatt Reader*, MA: Blackwell, 2005。

特和他的元历史理论，在美国学界被公认为新历史主义学派领袖的格林布拉特和他的文化诗学批评反而退居其次。究其原因，中国学者的理论选择和译介旨趣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旅行过程中无疑发挥了相当重要的文化过滤和导向作用。

诚如曹顺庆先生指出，“文化过滤指文学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交流信息的选择、改造、移植、渗透的作用，也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发生影响时，接受方的创造性接受而形成对影响的反作用”^①。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大陆学界的传播情况集中体现了本土研究者对异质理论的主体阐释和文化过滤，明显表现出重视历史理论建构、轻视文学批评经验的研究倾向。王逢振先生于1986—1987年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切身感受到了新历史主义在美国学界的强劲势头，继而在《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1988年）当中第一次全面梳理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轨迹，收录14位知名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的理论文章，其中包括海登·怀特、弗兰克·林特利查（Frank Lentriccia）和汤姆·金斯（Tom Elkins）等历史批评家的文章，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同样没有关注到格林布拉特和他的文化诗学批评。自此之后，有关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一般介绍性文章便零星不断地出现在诸如《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评论》等国内重要刊物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代表性论文包括：韩加明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兴起》（《青年思想家》，1989年第1期）、杨正润的《文学研究的重新历史化——从新历史主义看当代西方文艺学的重大变革》（《文艺报》，1989年3月4日、3月11日）、赵一凡的《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读书》，1991年第1期）、李淑言的《什么是新历史主义》（《当代电影》，1992年第4期）等。这些综述性的评论文章在现阶段看来似乎已经有点浅显和平淡无奇，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却大致呈现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谱系和历史轨迹，对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大陆学界的第一次研究高峰起到大浪淘沙的重要推动作用。

对于新历史主义在中国学界的传播历程来说，1993年标志着新历史主义的第一次译介高潮。就是在这短短的一年之内，大陆学界相继出版了三本在当时是开疆辟域、现今也是相当重要的译介著作。张京媛主编的《新

① 曹顺庆等：《比较文学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是大陆学界的第一本，也是涉猎最为全面的新历史主义译文集。它主要以美国学者哈罗德·阿兰·维瑟尔（Harold Aram Veesser）主编的《新历史主义》论文集为翻译源本，同时收录台湾学者廖炳惠博士的《新历史观与莎士比亚研究》和伊各斯教授为“历史主义”所做的阐释文章。其中，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通向一种文化诗学》和海登·怀特的《评新历史主义》等一直是新历史主义研究论著之中引用率最高的两篇论文。同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世界文论组也编译出版《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来介绍国外理论动态的总体情况，其中《文艺学新论》栏目共收录五篇重要译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思潮：由盛宁翻译吉恩·霍华德（Jean Howard）的《文艺复兴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介绍美国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脉络和理论阐释；由黄必康翻译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的《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对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做了详尽介绍；由盛宁翻译格林布拉特的文章《通向一种文化诗学》和由赵一凡翻译的文章《文艺复兴的自我造型》（导论）更是第一次将译介视角成功延伸到他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同年，由程锡麟等翻译的西方文论选集《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首次收录了海登·怀特的《“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和布赖恩·斯托克（Brian Scott）的《历史的世界，文学的历史》，为国内学人从历史理论重新审视新历史主义再次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

在新历史主义文论翻译高峰之后，盛宁、杨正润、韩加明，尤其是王岳川等国内知名理论家在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研究和本土阐释活动中表现得相当活跃，在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盛宁在《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将新历史主义批评作为当代美国文论的最新走向进行了详细深入的理论梳理。随后，他将最后一章的相关内容（即“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从历史认知演变和文学话语典范角度对新历史主义展开深度研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中国国内第一部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专著《新历史主义》（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在文论译介阶段，盛宁先生从历史观和文本观的演变谱系出发，细致梳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观念和实践意义，为新历史

主义在中国学界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在文论阐释研究阶段，他的《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1期）和《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等著述，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出发不断发难新历史主义的立论基础，揭示和探讨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历史观念之间的潜在关系。盛宁先生在新历史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研究热情和理论功底，极其深厚且令人叹止；他在文论阐释中所表现出的理性态度和探索精神，的确是无可比拟，令人钦佩。

在此期间，徐贲先生在《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文艺研究》，1993年第3期）和《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著述当中，以历史修辞学和历史释义学的批评视角，重新评价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在文艺复兴文学研究领域的批评形式和理论意义。王一川的《后结构历史主义诗学——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述评》（《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陆杨的《关于新历史主义批评》（《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张宽的《后现代的小小时尚——关于“新历史主义”的笔记》（《读书杂志》，1994年第9期）和韩加明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发展及启示》（《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5、6期）等著述，不但从理论谱系的历史视角全面回顾了新历史主义在美国学术界的理论生成过程，而且以理论旅行的跨文化视角深入探讨了新历史主义对中国文学界的经验借鉴作用和理论建构意义。杨正润在《主体的定位与协合功能：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1期）和《文学的“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两篇论文中首次将批评视角全面聚焦到格林布拉特和他的文学批评经验上，在“批评主体性”和“文学功能论”两个理论层面上，深度剖析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范畴和体系结构。李清的《振摆：新历史主义本文阐释模式》（《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重点关注格林布拉特的历史阐释实践，以“振摆”的对话性概念来深入阐释新历史主义的本文阐释模式，从而以中国本土的历史批评经验来重新审视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理论因子。王岳川和王逢振两位先生则对新历史主义在西方批评理论界的兴衰成败和个中因缘均做出全面细致的学术梳理和理论评价，同时也将自己置于西方学界

的阐释逻辑当中，不断揭示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死角和思想盲区。^①

尽管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学界对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研究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且颇有成果，但实际的文论译介过程明显存在某些偏重理论阐释而轻视批评实践、关注整个学派体系而忽视个体学者观念的研究倾向。正如辛刚国先生指出，这样的研究倾向必然会产生以下问题：一是对相关理论家的原文翻译太少，尤其是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文艺复兴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的相关论著；二是对相关批评术语和基本概念始终缺少必要的理论界定，导致阐释意义的非生态型生成过程和理论体系的非常态性建构效果。^②就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批评来说，新历史主义主要是在文艺复兴和前现代文化研究领域的文学批评实践，格氏的批评观念和话语体系也是完全呈现于历史视域的文本愉悦和文化疆域的文学经验。因此，诚如王宁先生所言，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阐释之中，“忽视批评实践的翻译是不明智的”^③，在文论译介过程中，批评经验的极度缺乏必然会导致理论阐释的过度生长，也就无法避免理论过剩和经验匮乏的历史困境。

从历史诗学的阐释向度出发，陆贵山先生指出新历史主义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历史转向”的，它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象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

① 王岳川先生从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两个理论向度对新历史主义批评展开深入的阐释研究，为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做出了相当重要的理论贡献，他的相关论著包括：《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23~31页）、《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第103~109页）。王逢振先生则以组织编译最新西方文论选集来积极传播新历史主义批评，他的《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收录于海登·怀特的《元历史》（导言），同时还收录了陈永国翻译菲尔皮林的《“文化诗学”与“文化唯物主义”：文艺复兴研究中的两种新历史主义》和黄必康翻译多利莫尔的《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等文章。

② 辛刚国：《新历史主义研究述评》，《学术月刊》2002年第8期，第111~112页。

③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78页。

特征”^①；陈晓明认为“新历史主义最实质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不过是德里达和福柯的综合运用”，因此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推翻了历史决定论的统治观念，还是重新肯定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集权主义，依然值得讨论”^②；张进侧重历史诗学的理论谱系，重新审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深层结构和现实意义，他的《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是继盛宁的《新历史主义》之后在国内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本重要研究专著；^③赵静蓉则把格林布拉特视为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联系到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主体理论，从新历史主义视角反思“历史主义”和“知识分子主义”理论。^④另外，从文化诗学的阐释向度出发，叶舒宪主张将文化诗学纳入文化人类学的批评范畴，指出“新历史主义所提倡的这种阐释方法比弗莱关于整合文学经验的种种努力更为精细和复杂，甚至要求超出狭窄的艺术经验，通过扩大的‘文学’观念来整合我们的文化经验”，但是他同时也阐明“文化诗学和原型批评虽在恢复文学的外部关系方面方向一致，但其理论中心已从文化中的文化引向了作为文化文本的文学”；^⑤刘悦笛则在文本间性、文化间性与主体间性的“复合间性”视角当中指出，“新历史主义者将历史语境看作是包括社会制度和实践等功能的‘文化系统’”^⑥，提倡从文化语境来观照文学文本的各种间性关系。对于文论阐释与批评经验的深度关联，盛宁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指出，“我们已经一再强调，新历史主义的批评不是回归历史，而是提供又一种对历史的阐释，可是新历史

① 陆贵山：《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解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130～136页。

② 陈晓明、杨鹏：《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268页。

③ 张进教授是近年来专注新历史主义研究的杰出学者，主要论著包括：《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通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历史诗学通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论新历史主义的读者接受观念》（《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批评工程论》（《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④ 赵静蓉：《颠覆和抑制：论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文艺评论》2002年第1期，第13～16页。

⑤ 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7、148页。

⑥ 刘悦笛：《在“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之间》，《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第65～69页。

主义却始终不能消除人们心头的印象，总给人以它就是历史所指的感觉”^①。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归根结底是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理论争鸣，从侧面暴露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中国学界经验错位和阐释过度的研究状况。

或许，正如翻译学者孙艺风先生指出，“翻译不仅意味着在原有编码和其他编码之间的‘译入’或者‘译出’过程，同时也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穿梭往返过程”^②。我们对于当代西方文论的文化阐释研究，也应该成为理论批评者在本土经验与西方理论之间的互动过程。唯其如此，“中国新时期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文艺实践（尽管与国外新历史主义之间存在着差异），就可以成为国外新历史主义的‘厚描’意义上的语境和参照系”^③。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20世纪文学”、“重写文学史”和“新历史小说”等各种批评思潮已经透露出新历史主义在当代中国学界的理论影响，在对传统历史主义和宏大历史叙事的解构实践当中，更是不断涌现重视主体经验和个体历史的各种理论著作和批评论说。

在文学创作领域，苏童的《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和《紫檀木球》，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以及格非的《迷舟》等众多作家作品都试图以个体视角重新叙述历史情境，明显透露出对历史个体和文化主体的理论重视和人文关怀；在文学史方面，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孔范今和黄修己分别主编的同名作品《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及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试图以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为理论依托，重新审视文学史本身的写作视角问题，致力于将那些长久被排除在主流文学史之外的文学作品重新引入当代文学艺术的历史舞台；在文学批评层面，陈思和的《关于“新历史小说”》（《文汇报》，1992年9月2日）、吴声雷的《论新历史主义小说》（《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王岳川的《重写文学史与新历史精神》（《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6期）、陈思和和王晓明的《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

① 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

② Sun Yifeng, “Translating Cultural Difference”, in *Perspective*,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5.

③ 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